

# 浅析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经济交往

## ——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

苏 玲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甘肃成县 742500)

**摘 要:**中国的统一与辽阔的疆域,由各民族共同缔造开发;中国的文化与历史,由各民族共同创造。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分析其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互相依存的经济交流是维系各边疆民族与中原关系的基础,也是少数民族向中原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北方游牧民族;中原;经济交往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020(2012)03-116-03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地地形、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地域之间经济文化面貌的巨大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产品各不相同。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得自古以来各地区与民族之间冲破山河阻隔,进行着日益密切的经济交流。

### 一、“华夷界限”与“天下一统”的思想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华夏与夷狄之分、民族歧视的观念和政策,如历代汉族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蒙元统治者的民族等级划分政策、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等。但是,“夷夏一体”思想、“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四月)的思想,始终与这些民族歧视的观念并存,并且成为统治者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如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海可使如一家。”“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

唐太宗的言论与政策,是历代君王抚绥和统治少数民族的榜样。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不同程度执行善待异民族政策,这是维护统治的需要,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中原王朝,境内都包括众多的民族。早在商周时代,境内就有戎、狄、夷、越等族;春秋时代,“夷蛮戎狄,犹错处内地”;汉、唐时期,疆域更加辽阔,所包括的民族更加众多。若没有合适的民族政策,就无法维持庞大的疆域。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来说,更是如此。如1125年之后契丹人在中亚和新疆建立的西辽王朝,其境内的居民则以回纥、粟特、鞑靼等族为主。在东三省割据的满族后金政权,兵马十多万,“半皆中华人(汉人)”(《筹辽硕画》卷四三),当时的辽东居民“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辽东志》卷一)。

随着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华夷之分的概念逐渐淡漠,各民族大一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亡国灭种的灾难和命运与共的处境,使各民族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也最终代替各种王朝或“天下”、“四海”、“九州”等称呼,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国家的名称。

### 二、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经济交流的基础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周边地区。这些地区与汉族聚居的中原(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相比,自然地理条件有巨大的差别。中原气候温和,土地平坦而肥沃,宜于农耕;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寒冷干燥,多草原、沙漠和森林,宜于牧业和狩猎;南方民族居住区气温高,潮湿多雨,多高山、丘陵、河流与湖泊,宜于农业和渔业。各个地区相比,中原物产最为丰富,经济文化最为发达,而各边疆地区的经济往往比较单一。

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边疆各少数民族有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中原地区也得到畜牧业等产品的补充。这种交流有朝贡、赏赐、互市等各种形式。经济上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是几千年来四边少数民族向中原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在对中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依赖和向中原积极发展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

历史上活跃在北方蒙古草原的相继有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和蒙古等游牧民族。由于游牧经济产品的单一性,牧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布匹、金属工具及各种手工业品等都需要用畜产品从中原换回。几千年来,交换的需要使其不断穿梭于漠北和漠南的长城一带。其中,有很多部落逐渐迁到长城一带,学会农耕,过着半农半牧甚至完全定居的生活,并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这也是中原汉族人口不断壮大和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更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收稿日期 2012-03-30

作者简介 苏玲(1980—),女,甘肃武都人,讲师。研究方向 历史及思想政治理论课。

最早在蒙古草原上建立游牧政权的是匈奴人。史称:“匈奴好汉缯絮食物。”当匈奴与中原王朝能够通过互市、和亲等方式交流物资时,对双方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史称,每年匈奴南下交换的牲畜“驴骡驮驼,衔尾入塞”,每次交换的数量常达“牛马万余头”(《后汉书·南匈奴传》),这使得中原地区缺乏牲畜的情况大为改善。西汉初年至文、景之时,皇宫专用的坐骑只有“厖马百余匹”,汉武帝统治时期,便出现“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繁荣景象(《盐铁论·西域》)。这些牲畜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业、农业等,促进了中原的经济发展。匈奴用畜产品换回大量的纺织品、粮食、金属工具、刀剑、乐器和书籍等,每年还得到大量金银和钱币,史称他们得到的钱币“动辄亿万”(《史记·匈奴列传》)。

呼韩邪单于时期,南匈奴大量南下,散布于长城附近,并要求归顺汉朝。于是,汉朝在长城沿线设郡县安置五千余户匈奴人,“与汉人杂处”。曹魏时,长城沿线的匈奴已“弥漫北朔”,并渐次进入山西汾河流域。西晋时,入塞的匈奴人达十九种,与“晋人杂居”(《晋书·四夷传·匈奴》)。西晋灭亡后,这些匈奴人相继在中原建立北凉、夏、刘汉和前赵政权。

也有的匈奴部落,如北匈奴,由于与汉朝相互为敌,断绝了政治来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随之中断,只得亡匿到漠北苦寒无水草之地,过着单一的游牧生活。由于长期得不到中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接济,不久就“兵数困,国亦贫”(《汉书·匈奴传上》),以致衰落下去,公元1世纪,残部西迁。

继匈奴之后鲜卑人占领蒙古草原,他们与中原之间的交往比匈奴更为密切,因而发展更为迅速。

鲜卑原居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交通不便,难以发展。于是,他们举部南迁,先到达蒙古草原东部,“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不久再次南迁,经“九难八阻”,到达阴山之南的内蒙古草原。他们积极与中原的曹魏和西晋政权通商和亲并接受册封,表示政治上的臣服。双方“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鲜卑将大量畜产品运进中原,曹魏和西晋给予鲜卑的“金帛缯絮,岁以万计”、“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鲜卑迅速强大起来,统一整个蒙古草原,并于公元340年定都于盛乐(今呼和浩特南)。接着进入中原,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并在盛乐和河套地区兴立屯田,发展农业,国力日益强盛。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数十万鲜卑人也移居中原各地。

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以及元朝灭亡以后的蒙古政权,能否维持与中原的经济交往,是其兴盛与否的重要原因。这种往来,不仅对社会发展有利,也使多民族国家日臻巩固。

公元552年,突厥在蒙古草原建立汗国。不久其疆域就扩大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周书》卷五十《突厥传》)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霸主。突厥是一个游牧汗国,能够如此强大,经济原因有:一是它乘中原离乱,控制了天山以南各农业绿洲,强迫绿洲居民缴纳白叠(棉花)、粮食等为赋税;二是北周、北齐两个政权利用突厥贵族来打击对方。北周、北齐对突厥贵族的骚扰不仅不加抵御,反而争相用财帛贿赂突厥。突厥首领佗钵可汗称:“但使我在南两箇儿孝顺,何忧无物

邪。”<sup>[1]</sup>双方官方与民间的贸易也畅通无阻。

隋朝统一中原之后,突厥可汗向隋称臣,官方每年以朝贡和赏赐的形式进行贸易。如开皇十二年(592年),突厥各部向隋朝进贡马万匹,羊两万只,驼、牛各五百头,隋朝回赐丰厚的金、银、钱币、丝织品和粮食等。隋朝还应突厥请求,“缘边置市”,在幽州、太原和榆林等地开设榷场,准许民间“交相往来,吏不能禁”(《册府元龟·外臣部》)。这种比较自由的贸易,吸引着草原牧民不断南下进入长城沿线。仅仁寿元年(601年),就有九万突厥人南下“内附”,长城沿线出现了“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景象。

唐朝初期,一部分突厥部落继续与中原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如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突厥一年就南下送马一万四千匹,唐朝“回赐”丝织品五十万匹(《曲江集》卷六)。唐朝人赞叹“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适度,田猎之用无比”,对中原的农耕、交通及军队必不可少,史称双方“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经济的交流推动很多突厥人进入中原,并逐渐定居下来。唐太宗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近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也有部分突厥人进入长城沿线今内蒙古和山西、陕西北部地区,从事农耕。神功元年(697年),唐朝曾送给他们谷种四万斛,丝绸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

有一部分突厥贵族与唐朝为敌,特别是后突厥汗国,与唐朝争战几十年。当时唐朝已控制了整个西域,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后突厥逐渐衰亡。745年,后突厥政权灭亡。突厥人一部分内附唐朝,一部分西迁中亚,大部分转入回纥汗国。

唐朝回纥汗国(744—840年)的兴起和发展,也明显地受益于同中原兴旺的经济交往。唐朝初年,唐朝在漠北回纥牙帐和漠南之间修建“参天可汗道”,道路共一千多里,沿途设邮驿六十六所,备有房舍、酒肉、马匹和车辆。路上的商队、使臣往来不绝,每队达“数千百人”,草原上的牧民也“老幼不惮遐远,悉手持方贡”南下交易(《册府元龟·帝王部·功业一》)。由于双方关系友好,回纥的商人可随意进入中原,当时在长安、太原、洛阳等城市,都有回纥商人的足迹。常年居住在长安的回纥使者和商人就达数千人。他们“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回纥政权一直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加速安史集团的灭亡。为酬劳回纥的军事援助,唐朝从至德二年(757年)起,每年给其绢二万匹。回纥每年向唐朝运送几万匹马(一匹马换绢四十匹),换取内地丝绢、茶叶等物。这些绢、茶等物品,除自用外,大部分被回纥运销于中亚各地。在中亚市场,“一两丝绸一两金”,回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回纥汗国也因此繁荣起来。很多贵族放弃游牧而经商,过上定居的生活。草原上也出现很多新兴的城镇,至今能够找到城墙遗址的还有二十多座。其中最大的城址达25平方公里,城内有宫殿、市场、居民区、寺庙和官署。在这些城址中,都发现了大量中原的钱币、金属工具、丝绸残片等物。<sup>[2]</sup>

北方蒙古政权与明王朝二百余年的和战关系,说明了正

常的经济交往对双方的重要性,特别是北方游牧经济对这种交往的依赖性。明初,蒙古贵族退居塞外,他们希望政治上得到朝廷册封,经济上与中原自由地贸易。双方的经济交往以“通贡”和“马市”等方式进行,其规模很大。据统计,从永乐元年到隆庆四年(1403—1570),蒙古贵族向明廷入贡达八百多次,每次的贡使达数千人,“前使未归,后使踵至”,达到贡使“络绎乎道,驼马迭贡于廷”、“金帛器服络绎载道”的局面,但明廷仅将此种经济交流视为维护边防和控制蒙古的羁縻之术。同时,明朝对互市有诸多限制,即“开市有日,货物有禁”,每年开市的次数少、时间短,不仅严禁军器交易,有时连锅釜、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也在禁例之中,并严禁任何私市。草原牧民常陷入“囊无釜,衣无帛”、“无茶则病”的困境(《万历武功录》卷八),汉族军民也因互市中断而缺乏军马、耕畜和皮货等生活用品。

为此,蒙古贵族发动了三十年的对明战争,双方损失惨重,明英宗也一度被俘。当战争停息,蒙古俺答汗在《答谢表》中感叹:“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耐夏热,段布难得,每次因奸人赵全等诱引,入边作歹,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今年各边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玄览堂丛书》卷一)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封他为顺义王。在汉人帮助下,在今呼和浩特地方建筑库库和屯城,成为蒙古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sup>[9]</sup>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死,统治权归其妻三娘子,明朝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继

续执行与明廷友好的政策,严惩进扰塞下的部将。这时,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进一步发展。明政府在张家口、大同等地陆续开设马市十三处,定期互市。此外,民间还有月市、民市。通过这些互市,蒙族人民以牲畜、皮毛等物换取内地的铁锅、布帛、粮食、茶叶和农具等。

可见,战争与断绝互市,给双方造成无法承受的苦难。只有不断加强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才是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互相依存、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是几千年来维系各边疆民族与中原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够长期维持统一的经济基础。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是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开始的,这种交往有官方与民间等形式。其间的一些武力冲突,由经济交往的障碍引起。当这种经济交往的障碍被打破后,就会带动政治上的联合。这种政治联合以边疆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依附形式进行,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也多次发动征服战争。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更大范围的统一,而战争的结果,则进一步加强了不同民族地区经济、政治及文化的联系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 参考文献:

- [1][3]朱绍侯.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28.
- [2]杨圣敏.回纥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15.

## The analysis on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Central Dynasties

——A Case about Northern Nomad

SU L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Longnan Teachers College, Chengxian Gansu 742500)

**Abstract** Chinese ethnic groups have reunified China and expanded her vast territory. And they also created jointly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with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Taking the Northern Nomad as an example, the writer has analysed th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Central Dynasties in this paper. Interdependently economic exchanges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to link the frontier and the Central Dynasties but also the power to urge them to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northern nomad;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exchanges

责任编辑 蒲向明